《三苏葬郏考略》：破解三苏葬郏之谜

○萧根胜

郏县是大文豪苏轼和弟弟苏辙的归宿地，元末添置其父苏洵的衣冠冢，故其墓园史称三苏坟。900多年来，三苏葬郏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其中一些谜团始终处于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状态，比如苏轼葬郏原因就有六种说法之多，莫衷一是。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以致有人质疑苏轼葬郏，甚至有媒体报道他地出现苏轼真墓。因此，破解三苏坟的诸多谜团，找回三苏葬郏的历史真相，对于提升平顶山市三苏文化遗产的价值意义尤大。

《三苏葬郏考略》作者乔建功先生穷十余年之精力，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发微显幽，寻根溯源，比较客观真实地阐释了苏轼葬郏的前因后果，撩开了三苏葬郏神秘面纱的一角。

三苏坟（资料图片）

●解密苏东坡葬郏的原因

苏东坡为何葬在郏县？凡是来到三苏园的人们首先都会问及这个话题。因为时久尘封，史无详载，《东坡先生墓志铭》只留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的遗言，所以千百年来人们苦苦寻觅苏轼何时来过郏县，何时到此选择墓地的蛛丝马迹，因而便演绎出了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选择墓地的“练汝说”；之后发现苏轼根本就没有到任，便又产生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前往汝州路过郏城，看中此地酷似家乡峨眉的“形胜说”。多少年来陈陈相因，几成信史。进入21世纪，随着苏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苏轼致子由第八简中有“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能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丧事，千万莫循俗也”答复苏辙的一段话，为研究苏轼葬郏之因提供了又一种思路，有人据此认为苏轼葬郏是同意屈尊与侄妇同用一葬地。乔先生不唯书、不唯众，首先弄清轼、辙兄弟在北宋晚期一系列党祸纷争中的沉浮遭遇，理顺当时苏氏家族的人事活动踪迹，在阅读研究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考证出苏轼葬郏事涉他们兄弟二人来往的三封书信及七篇祭文。然而，这三封信只有苏轼答复苏辙的一封信保留比较完整。于是他就紧紧抓住苏轼复信中关于葬地一段话这个“牛鼻子”，弄清其写作背景，把握其内涵和外延，写出了《辨析苏辙二月二十二日书信关于葬地的内容》一文，复原了他们兄弟二人为葬地之事所来往三封书信的商讨过程。原来苏东坡既没有到此亲勘葬地，也没有为小峨眉命名，所谓“即死，葬我嵩山下”，是告诫弟弟不要再花钱另买葬地，就用自家田地的叮嘱。在研读过程中，他发现《苏轼年谱》述及祭文处存在几个疑点，就大胆致信作者孔凡礼先生陈述自己的意见，结果得到孔老先生亲笔复信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先后写出了《三苏园中的两个黄氏女》《苏坟应是苏家的自家田地》等论文，破解了探因过程中的一个个问题，终于弄清楚，所谓苏轼葬郏实际安葬的是四个亡灵，出现的是三个坟墓，起初这里就是以族墓的形式出现的。苏轼葬郏的真正原因：这里是轼、辙兄弟二人于困顿无奈中在自家田地上辟设的流寓在外的苏氏族茔。苏轼归葬小峨眉完全是一任自然，天意巧合。

●解密苏坟、二苏坟、三苏坟

关于三苏坟的沿革，传统认为苏轼葬郏称“苏坟”，苏辙葬郏后称“二苏坟”，元末添置苏洵衣冠冢后称“三苏坟”。乔先生研究认为，这里开始从筹划计议到逐步实施，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名副其实的苏家族茔，这里埋葬着苏家祖孙五代有文字可考的即达二十多人，其准确称谓应为“苏坟”。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他指出两处错漏。一是二苏墓碑名不副实。苏轼、苏辙当年都是同各自的夫人同穴合葬，而现在看到的墓碑却是“宋东坡子瞻苏先生墓”和“宋颍滨子由苏先生墓”。二是对苏坟的说法有误。传统认为，北宋灭亡南迁后苏家后代流散各地，苏坟就香火断绝，沦为荒芜了，上下延续的时间只有25年左右。乔先生通过考证“苑中碑”和《金史》等有关史料，证实有金一朝苏坟不但保护完好祭祀不断，并且留下许多社会贤达拜谒的碑碣石刻，呈现一片祥和景象，苏坟真正遭到重大破坏是蒙古铁骑入侵，金朝灭亡之际，其实际延续的时间上下达130余年。为了印证这个论断，他还亲赴当年苏辙寓居的许昌县椹涧乡西长店村以及苏家后裔聚居的苏桥村进行考察，结果与论断完全吻合。他写就的《三苏坟究竟葬几人》先后刊载于《三苏》《超然台》《放鹤亭》，最终发表于《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六期，并收入《苏轼研究》。

●解密苏家族茔的迁移

三苏园中的广庆寺明明在坟院的西南，而苏辙在《再祭亡嫂王氏文》中说“茔兆东南，精舍在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多少年来一直使人不明就里。乔先生在参阅大量文献和现场踏勘墓地的基础上，写出了《发微显幽 探骊得珠——苏坟茔兆曾东移》一文。该文精辟地阐释了不是苏辙说错了方向，也不是广庆寺迁移了位置，更不是书写印刷有误，而是苏家的葬地原本靠西，后经人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迁移的过程是，苏轼的门生李廌前来吊唁时察看苏家葬地，发现东去不远就是小峨眉的箕形山坳，是可遇不可求的堪舆佳城，于是就趁苏轼灵柩在广庆寺待葬80天的间隙，往返奔走于许汝间说服苏辙，把茔兆东移到现在的位置。李廌此举在《宋史·列传第二百三·李廌传》有载。因为苏辙四月二十三日写就祭文时还没有东移茔兆的动议，所以后来才出现广庆寺的方位与苏辙祭文所述不一致的问题。之后，乔先生又挖掘历史素材写成《大诗僧参寥子——凭吊苏坟第一人》一文，向世人介绍了东坡挚友大诗僧参寥子在苏轼葬郏两个月之际，来郏城凭吊苏坟尘封千年的感人故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平顶山学院教授刘继增先生一再称赞这两篇文章考证缜密论据充分，破解了三苏坟多年的难题，填补了三苏坟研究的空白。

●解密苏坟格局

出坟院大门南行百米处，神道两侧分别有两座坟墓，西边是顺治初年发现的苏迟夫人梁氏墓（苏辙长房儿媳），东边是1972年发现的苏仲南（苏辙次子）夫妇合葬墓。它们为什么孤零零地坐落在坟院大门外同父辈的坟墓相距半里之遥？所依据的是什么葬法？长期以来使人困惑不解。这是三苏园最难解的一个谜团，也是乔先生着力最多的一个难题。为此，他曾遍阅史料，走访朋友，咨询名家，拜谒过欧阳修、范仲淹的陵园，还赴襄城县王洛乡房村、许昌县灵井乡禹王城及安阳市殷都区皇甫屯村，寻访和苏轼同时代的范镇、韩绛、韩琦等人的坟墓，极力寻找打开这个谜团的锁钥。通过认真观察，缜密考证，乔先生终于写出了《穿越历史烟云 寻觅二苏真茔》一文。该文大胆地对现有的二苏坟墓提出七个疑点，证实其不是真茔。文章指出，二苏真茔应是甲山庚向穴，其墓碑应是同各自夫人合葬墓碑。然后根据苏坟的夹棺葬法，推测出苏家子辈其他四人坟墓的位置，并绘制出了《苏坟原貌示意图》。文章最后阐述了造成这种舛误的历史原因。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刚任汝州知州的元叔仪前来祭扫苏坟，看到这里坟墓荡平一片荒凉，唏嘘再三，无奈之下，只好象征性地堆土为坟，立二苏先生墓碑聊以寄托哀思。元叔仪的此举记录在尚野所写的《二苏先生墓碑记》中。从此代代相传，致使苏坟成了当今的格局。

2013年7月，我和乔先生一起参加第十八届国际苏轼学术研讨会。其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原会长、四川大学资深教授、享誉国内外的苏学专家邱俊鹏先生找到乔先生说：“我发现近几年你是专门写有关苏轼葬郏文章的，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看过，你算把三苏坟的事情说清楚了！”并叮嘱在场的三苏研究专家说：“以后关于苏轼葬郏的事情不要再随便说了！有什么疑难问题你就找他！”

乔先生是一位敢于怀疑，善于怀疑，勤于思考的人。他能够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疑点；能够从众人熟视无睹的史料、碑刻中采撷一个个论据，并能够将这些碎片有机地串联起来，周详备至，力求言必有据，言之有理。他连续写出数十篇文章，篇篇都有真知灼见，入情入理，系统全面地阐释了苏轼葬郏的一系列疑难问题。

读史品源 话摩陂

○温书功 李增强

蓝河入汝处的古蓝桥至阴山一带，古称摩陂。

●摩陂何意？

“摩”的解释是接触的意思。《说文解字》：“陂，阪也。”《礼记·月令》注：“畜水曰陂。”《淮南子·说林》释意为“湖泊”。《诗·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意为水聚集的地方。《现代汉语词典》是可以停靠的水湾，多用于地名。摩陂在这里理解为依山的大湖泊。

摩陂，具体在什么地方？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一载：“汝水东南流，又与白沟水合。白沟水南经龙城西，城西北即摩陂也。纵广可一十五里。魏青龙元年，有龙见于郏之摩陂，明帝幸陂观龙，于是改摩陂为龙陂，其城曰‘龙城’。”综合《水经注》有关摩陂方位的记载，及多方考察该地区的山川地势，基本可以断定，汉魏时期称为摩陂的湖泊，就在今天的郏县东南长桥镇境内，今阴山以北河里圈一带。（注：堂街镇河里圈5个行政村、13个自然村历史上归长桥镇管辖。）但因为年代久远，摩陂今已无存。

●三国时期的摩陂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一时间金戈铁马，尽显风流。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扩充军需采纳枣祗和韩浩的建议，实行屯田。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募民屯田，并在所占领州县设置典农中郎将，推行屯田制；在军队中大兴军屯，从驻守的长桥摩陂沿阴山向北填河造田建立大型军屯基地。今天的堂街镇河里圈13个村庄就是当年屯田的结果。

曹操还在摩陂设置行宫，指挥两大战役，一是指挥了阻击关羽北进的襄樊战役，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平寇将军徐晃振旅还摩陂，曹操开庆功大会，在摩陂发布《劳徐晃令》。二是封徐晃为平南将军，守襄阳，引诱关羽再取荆州，在吴大将军吕蒙趁关羽失势之机，击其后，关羽兵败被杀，当徐晃振旅还摩陂时，曹操亲迎，此事在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三国志·关羽传》中有载。《三国演义》更是把关云长大战徐晃演绎得淋漓尽致，使摩陂“声名大噪”。此战的胜利，为曹魏伐汉铺平了道路。在徐晃从襄樊回军，进入摩陂曹操大营时，曹操亲自为徐晃编写铜器舞，并在堂街镇前营村建起回军庙，在阴山竖起摩陂碑，昭其功劳，立石为记。

《三国志·魏书·徐晃传》曰：徐晃破关羽，振旅还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会。太祖举卮酒劝晃，且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后回军庙数废数修，鼎盛时期，有殿堂50余间，拥有庙禅30余亩。于1958年被拆除，砖瓦木料被运往李庄村修建学校所用。2004年在原址又重修大殿两座，搜集古碑刻6通，并恢复了“义茶站”，方便行旅。

●“青龙”与龙文化

真正使摩陂声名远播的是“青龙”的出现。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记载：“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於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

《宋书·符瑞志·中》载：“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帝亲与群臣共观之，既而诏书工图写，龙潜而不见。”曹睿随令文臣对此吟诗作赋，流传至今的有缪袭的《青龙赋》和刘邵的《龙瑞赋》。

《黄览》记载时任魏国骑都尉刘邵在《龙瑞赋》里对此事的叙述：“太和七年春，龙见摩陂。行自许昌，亲往临观。形状瑰丽，光色烛耀。侍卫左右，咸与睹焉。自载籍所纪，瑞应之致，或翔集于邦国卓荦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青龙年号历时五载，摩陂青龙是曹魏鼎盛的象征。

如今龙文化遗迹在郏县比比皆是。其中以“龙”命名的行政村有12个：如龙泉寨、龙王庙、龙头槐等；以“龙”命名的寺庙5座：白龙庙、龙兴寺、龙泉寺等；山名2处：大龙山、小龙山；以“龙”命名的水有8处：青龙湖、黑龙潭……

●源自摩陂的文化遗产

成语“长驱直入”的典故也出自于摩陂。《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却说樊城围解，曹仁引众将来见曹操，泣拜请罪。操曰：“此乃天数，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赏三军，亲至四冢寨，周围阅视，顾谓诸将曰：“荆州兵围堑鹿角数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获全功。孤用兵三十余年，未敢长驱径入敌围。公明真胆识兼优者也！”众皆叹服。操班师还于摩陂驻扎。徐晃兵至，操亲出寨迎之。见晃军皆按队伍而行，并无差乱。操大喜曰：“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遂封徐晃为平南将军，同夏侯尚守襄阳，以遏关公之师。操因荆州未定，就屯兵于摩陂，以候消息。

摩陂也是郏县大铜器舞的发源地。作为中原地区独树一帜的传统民间艺术——郏县大铜器舞，以演奏技巧性强且表演形式多样，音律铿锵，风格粗犷，场面壮观而著称。始于东汉晚期，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五月，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襄樊大战获胜后，曹操在摩陂给将士们庆功，命宫中乐师和郏县工匠打铜器助兴，鼓舞士气，抒发豪情。从此，大铜器舞在郏县境内广为流传，并辐射到周边漯河、宝丰、汝州、襄城等地，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如今郏县的东街、长桥镇的东长桥和窦堂等有庞大的铜器舞表演队。

郏县大铜器舞的古谱历史悠久，曲牌较为丰富，大多以时代背景和战役命名。目前，经过郏县文化部门和民间艺人挖掘，已整理出“五虎下西川”、“曹操得胜鼓”、“马面川”、“呼雷炮”等36支传统曲牌。1988年，在河南省首届艺术节大赛中，郏县大铜器舞荣获一等奖。1992年，郏县大铜器舞代表河南省参加“中国沈阳国际秧歌舞蹈节暨民间舞蹈节”大赛，荣获第一名。同年12月，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群星杯”评奖，郏县大铜器舞又获广场舞蹈金奖第一名。1993年1月，郏县大铜器舞参加北京“龙潭杯”民间舞蹈大赛，再次夺魁，荣获三连冠。外国专家称郏县大铜器舞为“中国农民的迪斯科”。2008年6月14日，郏县大铜器舞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尽，金戈铁马之声不再相闻，唯有现存的残碑断碣向世人无声地述说着它远去的历史和沧桑……

郏县大铜器舞（资料图片）

妙善公主生父“庄王”漫谈

○赵西广

滍汝流域很早就流传“家家有弥陀，户户有观音”的说法。正因为观音普遍受到欢迎，中国民间也就出现了有关观音菩萨的传说。其中，妙善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唐代道宣律师《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其中提到他曾经听说观音过去是妙善公主。然而，妙善公主的生父是谁，仍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统一的说法。

据《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述：“山之东北，乃过去有国王名庄王，有夫人名宝德，王心信邪，不重三宝。王无太子，唯有三女，大者妙颜、次者妙音、小者妙善。”这段文字明确说明，妙善公主的生父是身为国王的庄王，生母是宝德夫人；又说出了国王无太子，只有三女，最小者是妙善。只是“庄王”给后者留下诸多疑团。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史料及传说多种多样。笔者总结了一些：

明《汝州全志》：“大悲菩萨相传楚庄王第三女也，讳妙善。”

明正德《汝州志》：“香山寺在（宝丰）县东南二十五里父城保大小龙山之中，上有玉峰塔，世传大悲菩萨，楚庄王之女，修炼成佛之所，灵骨至今葬于塔下。”

清道光年《汝州全志》卷七《仙释》条云：“大悲菩萨，相传父城楚庄王之第三女也，讳曰妙善……庄王封为大悲菩萨且命建香山寺。”

宋普明撰的《香山宝卷》：“迦叶佛时，须弥山西有一兴林国，国王名婆迦，年号妙庄，国王的女儿叫妙善。”

《平顶山〈香山大悲菩萨传〉研究》一书中注释，庄王：“妙善之父，平顶山称其为楚庄王，后世有称为妙庄王”。

《观音信仰与吴越佛教》一文中有段关于“庄王”的记述：“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为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施即如故。”作者韩秉芳解释道：“此后，则有人在庄王前面加‘妙’字，也有人在前加‘楚’字，说法始终不一。”

另外，《平顶山〈香山大悲菩萨传〉研究》一书中，王宝郑在《平顶山香山寺的佛教文化特征要论》一文中，对妙善之父这样记述：“观音这个佛教人物传入中国之后，其出身也随之中国化，佛教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最普遍的说法是王族出身，俗身叫妙善，其父叫庄王（楚庄王、妙庄王、苗庄王、妙庄严王），平顶山地区流传的有楚庄王和苗庄王等说。”

我们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妙善公主的生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生父“庄王”，总结史料记载及传说，概括起来有四说，其一楚庄王之说、其二楚王之说、其三妙庄王之说、其四苗庄王之说。

首先就楚庄王和楚王之说谈起，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史论学家白鋐著《白雀寺考》对妙善公主生父“庄王”予以探究，对“庄王”传说是“楚庄王”或“楚王”的说法予以否定，《白雀寺考》碑文中对其这样论述：“春秋时叶地属楚，相距六十里许，此为楚庄王似矣……汉明帝时，佛始入中国，春秋无佛，安得笃生神女为大悲菩萨乎。”

其文字是说春秋时期叶（今平顶山市叶县一带）属于楚国的地域，相距约六十里的父城（今宝丰东约十五公里父城遗址上的古城），这里所说的“庄王”好像是楚庄王……但是东汉明帝时，佛教才开始传入中国，春秋时期中国还没有佛教文化，哪里会来个神女大悲菩萨呢？

在同一碑文中还记述：“明帝永平间，遣博士蔡愔等十八人入天竺迎佛法，独许美人所生的楚王先好之，此为楚王英似矣……况英以缣帛助伊蒲之盛馔，而与方士造作图书有逆谋，废徙丹阳自杀。夫以反见杀，安得有谥。且明帝名庄，汉人讳之，即臣下之姓，尚改庄助而为严矣，岂有反叛之臣谥主上之讳，而略无顾忌乎。”

该文字是说：在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遣蔡愔等十八人去天竺佛国（印度）迎取佛法并带回经书，唯独由许美人（刘秀妃子）所生的楚王（刘英）最先对佛教文化产生好感，据此所说的“庄王”又好像是楚王（刘英）……况且刘英给豪赌的僧人大量的钱财，致其大摆筵席，挥霍无度，又与方士捏造图谶之书，搞谋反活动，而被废黜爵王之位，迁徙至丹阳后（刘英）也自杀了，他（刘英）被逼自杀，怎么还会有“庄王”这个谥号？况且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汉朝人是很避讳帝王名字的，就是他的王公大臣也要更名改姓，当时有个叫庄助的人（就）改叫严助了，岂有反叛之臣，谥号为皇上名讳而一点都不顾忌吗？

在排除了“楚庄王”和“楚王”之后，那么妙善公主的生父是“妙庄王”还是“苗庄王”呢？

《白雀寺考》碑文又载：“然光武徇颍川，屯兵巾车乡，冯异为汉兵所获，曰家有老母在父城，遂与其长苗萌率五城以降，帝即署为主簿。是父城县在东汉之先也，《左传》谓楚城父城。”

这段文字是说东汉光武帝刘秀决战并夺取颍川（今河南禹州一带，包括父城）兵马安营扎寨在巾车乡（今平顶山市滍阳镇的留村），冯异被刘秀部下擒获，冯异说家有年迈的老母在父城（刘秀被冯异的孝心所感动而善待了他，冯异也被刘秀的德行所感动），于是冯异就与父城长（县令）苗萌率五个城来归顺刘秀；汉光武帝立即任命冯异为主簿，从这里看（颍川郡）所辖的父城县在东汉之前就有了，《左传》上称的楚国的城父就是这座城。从这些文字看苗萌只是东汉时期父城县的一个县令，而并不是所为妙善公主的生父“庄王”了。

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平顶山归属楚国，而楚国的国都又在现今的湖北省江陵一带，当时楚平王曾派太子建镇守楚国北疆的重地——城父（秦汉以后称父城），这就是后人传说的“庄王城”。这一地区的先民为了纪念楚庄王（熊绎）建立城父有功，在父城设立了庄王祠，后人将庄王祠视为庄王故宅，到东汉光和年间，父城又修建了白雀寺。史料及传说显示，妙善公主又是从白雀寺出家修行终成正果。在上千年传说中，由于“妙”“苗”两字音同字不同，“妙”“苗”混淆，为此后者不免将父城长苗萌说成了“苗庄王”。

根据以上分析，妙善的生父“庄王”为“妙庄王”是比较准确的。区区之见，借作漫谈。